

耶穌會士與儒士的相逢·西方與東方的交會 ——利瑪竇逝世400周年紀念展覽

黃文德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

今(99)年1月30日,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與耶穌會臺北利氏學社(Taipei Ricci Institute),簽署學術合作協議,將5萬餘冊中西文圖書藏書永久寄存國圖,並設置「利瑪竇太平洋研究室」典藏,此舉堪稱臺灣近十年來國際文化交流之盛事。由於利氏學社係以紀念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Matteo Ricci, 1552-1610)為名,今年恰逢利氏逝世400週年,為表達世人對一代知識巨擘的崇敬。在教育部、外交部、教廷駐華大使館陸思道代辦(Paul Fitzpatrick Russell)、天主教耶穌會中華省省會長詹德隆神父(Fr. Louis Gendron S.J.),以及義大利經貿文化推廣辦事處代表馬忠義(Mario Palma)的支持下,經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協助,陸續取得梵蒂岡圖書館(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耶穌會羅馬總會(Curia Societatis Iesu)、宗座額我略大學(Pontificia Universita Gregoriana)等單位贊助提供數位文獻,共襄盛舉,籌畫一系列活動。活動同時邀請輔仁大學歷史系兼中國天主教文物館館長陳方中教授協助

展覽教育訓練、撰文、策展;臺北利氏學社圖書室前主任陳聰明教授策劃介紹利氏圖書珍籍,裨益更多讀者瞭解利瑪竇在歷史上的地位。

展覽時間自99年4月17日至5月16日,地點位於本館閱覽區六樓「利瑪竇太平洋研究室」,內容包括:追尋利瑪竇的歷史足跡、利氏故鄉馬切拉塔(Macerata)與義大利、利瑪竇及其中國朋友、利氏與中國漢學、利氏與耶穌會,以及明清文獻中的利氏資料等主題。展品除了館藏明清時期善本文獻、天主教輔仁大學神學院典藏早期利氏出版文獻、海外贊助單位珍籍數位影像,以及光啓社、義大利導演克倫德雷卡(Gjon Kolndrekaj)授權利氏相關影片。透過這些珍貴難得的文獻史料呈現,希望讀者可以細細追索利氏傳教生涯及生活點滴,重新體驗十六世紀末、東西方文化撞擊的世界。

一、利瑪竇及其中國朋友

西元1583年,利瑪竇抵達明帝國統治下的廣東肇慶,開啓他與中國友人的交往。最初他是以



本館利瑪竇太平洋研究室

「天竺國僧」的身分活動，後來在南昌經門生瞿汝夔的建議，才以儒服形象與士大夫階層交往，並結交至少 137 位中高級政府官員與學者，成功地将天主教思想與西洋科學知識帶入中國知識界。這群士大夫有的受洗入教，成為天主教重要標竿，如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合稱為教會三大柱石。他們與利氏的互動主要建立在學術與哲理的討論、協助編譯西學，以及擴展天主教人際網絡。本節主要挑選這群知交與利氏之間的知識互動，以及後者探討西學、天主教義的重要論著，如馮琦等編，《萬曆辛丑會試錄》，根據黃一農院士研究，萬曆 29 年（1601）利瑪竇透過南京刑部侍郎王汝訓的介紹，認識當時擔任吏部侍郎的馮氏，雙方結為知交，經常討論學術。馮氏升為禮部尚書以後允許利瑪竇搬至四夷館外居住，意義重大。這份名錄當中包括黃建衷，曾經考證利瑪竇《幾何原本》，並有多人曾為耶穌會教士之著作撰寫序言，如彭惟成序熊三拔之《泰西水利法》；崔溟序龐迪我之《七克》；熊明遇序《七克》與熊三拔之《表度說》；鄭以偉序《七克》與《泰西水利法》；彭端吾序《西聖七編》，顯示耶穌會士透過士大夫階層傳教與建立人際網絡策略奏效。另外，晚明思想家李贄（1527-1602）在《焚書》稱讚利氏：「凡我國書籍無不讀，……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此間之文字，行此間之禮儀，是一極標致人也。」，另外本區也展示利瑪竇代表作《交友論》，本書內容彙集西方文人論友格言錄。他在序言以大西域山人稱呼自己。書中不少話語曾出現在晚明文人著述當中。

二、利瑪竇與中國漢學

利瑪竇為西方研究中國漢學之先驅之一，基於傳教上的需求，早在澳門、廣東時期他就開始嘗試以羅馬拼音建立漢語拼音系統。目前藏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的

《葡漢辭典》前身《平常問答詞義》手稿，即能看到他與羅明堅神父（Michele Ruggleri, 1543-1607）兩人如何以羅馬字對漢字進行標音。至南昌傳教時期，他更注意到如何運用研究中國語文詮釋經典，達到漢學與西學之間的融會貫通，以獲得中國士大夫的重視，如《程氏墨苑》收錄四幅《寶像圖》：「信而步海，疑而即沈」；「二徒聞實，即舍空虛」；「淫色穢氣，自速天火」；「聖母懷抱聖嬰耶穌之像」。前三幅畫另附有羅馬字拼音解釋。這些圖像是製墨世家程大約根據利瑪竇提供西洋銅版畫作稿本臨摹後，再由墨工刻製的圖像。另外，利氏對於中國漢學的態度，影響深遠，如為利氏作傳的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即以利用拉丁文拼音建立中文拼音系統，首度融合字書與韻書。近年台北利氏學社出版《利氏漢法辭典》（Le Grand Ricci），也可說是繼承利氏推展漢學的志業。另外，展覽內容也首度公開 18 世紀杜赫德神父（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編撰的《中國帝國全志》（*Descript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4 冊，該套書籍曾刊載不少耶穌會士介紹中國風土與漢學，極為珍貴。



國家圖書館館藏《中華帝國全志》

三、利瑪竇與耶穌會

本項主題挑選包括早期耶穌會士介紹天主教義

著作，以及明末利氏之後來華耶穌會士與中國士大夫合譯之西學，如1601年與利瑪竇一同晉京的耶穌會教士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之《七克》，該書背面右題「天主降生一千六百四十三年極西龐迪我撰述」，闡述應如何克制天主所禁的驕傲、嫉妒、慳吝、忿怒、迷飲食、迷色、懈惰于善等七罪。本書應為三大柱之一楊廷筠協助潤飾而成。另外，《奇器圖說》為中國第一本介紹西方物理學與機械工程著作，由日爾曼傳教士鄧玉函（Johann Terrenz, 1576-1630）撰，王徵譯。鄧氏為明末入華耶穌會士，精通多國語文、醫學、植物學與天文學，來華後多在浙江傳教，後奉召入京，協助徐光啓修曆。王徵（1571-1644），陝西涇陽人，喜好工藝技術，他見金尼閣（Nicolaus Trigault, 1577-1628）將不少科學工藝著作帶到中國，因此請鄧玉函協助摘錄科學著作數本，再由王徵筆錄並繪圖。本次展覽版本為清四庫全書南三閣之一的文瀾閣鈔本，因遭太平天國戰禍，全書僅存卷三，並缺第一葉之前半葉，相當珍貴。

四、明清文獻中的利瑪竇

自1583年利瑪竇進入廣東肇慶建立第一座天主教堂，中文文獻也開始出現有關他的紀錄，不論是「泰西儒士」、「大西域山人」、西泰、利子，描述他的舉止談吐、學識、傳教風範，甚至探討其帶來西方的新穎繪畫技法、奇器、地圖、音樂，都顯示這位耶穌會士對當時明帝國士大夫的巨大震撼。1610年利氏逝世後，有關他的紀錄未曾稍減，不少清代士大夫在讀到他的《交友論》、《坤輿萬國全圖》後，或者到利氏墳墓憑弔後，撰文寫下對一代知識巨擘的崇敬。

另外，利氏對中國的影響也表現在藝術層面，如姜紹書，《無聲詩史》介紹470位明代畫家時就提到：「利瑪竇攜來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資料提供：梵蒂岡圖書館）

嬰兒，眉目衣紋，如明鏡涵影，蹣跚欲動。」光影的表現技法，令姜紹書印象深刻。而顧起元在《客座贅語》也提到「利瑪竇西洋歐邏巴國人也。……所畫天主，乃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以銅板為燈，而塗五彩於上，其貌如生，身與臂手儼然隱起上，臉之凹凸處，正視與生人不殊。」他並且稱讚利氏所著《天主實義》多新穎，而獨於天文，算法為尤精。

五、有朋自遠方來

此次籌備展覽過程，除本館館藏外，海外數位資料的提供，主要歸功於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王豫元大使與高國亮秘書以及外交部歐洲司的協助，他們以專業、效率與熱誠，經數次交涉取得以下重要藏品數位檔案，作為展覽使用：1. 梵蒂岡圖書館提供所藏利瑪竇神父部分著作、首版「坤輿萬國全圖」影像電子檔；2. 取得耶穌會檔案館，授權本館使用利氏簽名影像、利氏病逝次日耶穌會弟兄由游文輝（Emmanuel Pereira）所繪製畫像、利瑪竇相關檔案簡報、利氏著漢服圖，以及利氏遺骸圖像；3. 取得宗座額我略大學館藏利瑪竇就讀羅馬公院時期的誓詞、羅馬公學銅版畫。



教廷文化亞杜克努神父、顧敏館長、馬斯卡神父委員會秘書長（由左至右）於參觀利瑪竇太平洋研究室與紀念展後合影。

本次活動受到教廷方面高度重視，包括4月18日教廷文化委員會秘書長亞杜克努神父（Fr. Barthèlemy Adoukonou）、馬斯卡神父（Fr. Theodore Mascarenhas），以及22日由教廷駐華大使館陸思道代辦陪同教廷社會科學院秘書長索隆多主教（Marcelo Sánchez Sorondo）參觀利瑪竇太平洋研究室與紀念展，顯見專室的設置，不只是國圖推展知識服務理念的擴大，也是國際漢學交流的新里程碑。

最後，誠摯感謝各界對於國家圖書館籌辦利氏逝世400周年活動的支持與協助，藉此展覽期待利氏風範與他跨越東西方知識理念能在這裡生根茁壯，使「利瑪竇太平洋研究室」的成立能嘉惠更多研究者。

《更正》



利氏學社致贈畫作供國圖典藏，左為詹德隆神父，於99年第1期（總號第123期）51頁誤植，特此更正。